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有机衔接科技创新的

□ 胡明艳

2020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和政府统筹作用，促进资金、技术、应用、市场等要素对接，努力解决基础研究“最先一公里”和成果转化、市场应用“最后一公里”有机衔接问题，打通产学研创新链、价值链。

“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是长途跋涉中的不同历程，分别指的是刚开始的起跑阶段和行程的最后一段。习近平总书记用“最先一公里”比喻科技创新的基础研究，“最后一公里”比喻成果转化和市场应用，生动形象地指出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先导和源头，成果转化、市场应用则是将科学技术研究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最终途径，强调科技创新是一个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成果转化、产业化等紧密衔接的过程，必须着力打通产学研创新链、价值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发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看到发展进步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科技创新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挑战：一边是不断提升的创新能力，表现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高水平科研论文发表量和专利数量逐年攀升，跃居世界前列；另一边却是企业看不到产品就不敢投资的现实考虑，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率还不高，大量创新成果还停留在技术报告、科研论文或实验室样品层面，无法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创新链与产业链“相望难相见”等问题还比较突出，科技创新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之间还存在着堵点、卡点，整个科技创新链还不畅通。

回顾历史，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基础研究产生巨大突破的基础之上的。展望未来，当科技发展进入难以预测的前沿“无人区”，更需要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活力，让基础研究真正发挥出其作为整个科学体系源头、所有技术问题“总开关”的作用。所以，“最先一公里”必须和“最后一公里”有机衔接，只有把基础研究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进而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才能让科技创新真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科技创新是一个多元主体基于共同价值主张而构建的开放、动态演化的生态系统。其中，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中介、风险投资、上下游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等是紧密联系、有效互动着的创新主体，要实现“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畅通衔接，需要他们利用各自所长互惠互利，最终实现共创、共享与共赢。首先，应发挥政府统筹作用。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的定位和布局，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营造良好的科研导向和人才评价软环境，构建基础研究的多元投入机制，引导建立多方参与的收益分配机制，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从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其次，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对于市场需求的反应最为灵敏，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主体。除了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好奇心驱动型的基础研究，还应从体制机制上支持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密切合作，通过组建创新联合体、建设科技创新平台等方式，面向产业需求共同凝练科技问题、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协同培养科技人才，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最后，健全完善科技成果高效转化的服务体系。科技成果只有通过转化应用，才能成为现实生产力。应积极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各类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容错机制，鼓励多元化成果转化模式，培育专业的技术转移机构和人才队伍。

当资本和产业愿意往前端走，科研愿意往后端走，“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就得以畅通，基础研究就不再只是技术报告、科研论文、实验室样品，而变成了市场产品、技术实力、产业实力，科学技术就真正成为了第一生产力。

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重温任弼时《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

□ 朱昔群

重读经典

1941年10月至12月期间，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为宣传阐释《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后收入《任弼时选集》，这篇重要文献重申了党的团结统一问题，明确而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党性以及增强党性的方法问题。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重读这一文献，既是对革命传统的传承，也可以为继续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启示。

党性的内涵和特征

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党中央文件的形式对党性问题作出了明确的指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增强党性首先必须对党性的概念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任弼时指出“增强党性的决定是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他首先从四个角度明确而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党性、应该怎么理解党性。

一是党性取决于党的性质。任弼时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通过明确政党的性质与党性之间的关系，强调政党的性质决定党性，不同的政党具有不同的党性。二是党性是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是一个主动的东西。任弼时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他还强调，“要深刻地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我党的最高利益，应该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这个利益服务，并且要使得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自

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无产阶级政党党员并不是天然的就具有党性，需要通过学习 and 锻炼，形成主动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而且一般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不是党性，升华的、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才是党性。这种觉悟和意识体现在对无产阶级利益的深刻理解和坚定维护上，体现在为党的事业服务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上。这一理解不仅明确了党性的阶级基础，还强调了党性修养的主观能动性。三是明确了党性可以用一些标准来测量。任弼时指出，政党的党性可以通过其成员的具体思想意识、政治观点和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这就使得党性概念更为具体化。四是党性需要综合组织和思想等多个维度来理解。党性是党员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体现出来的综合属性。任弼时强调，党性不仅体现在思想上，还体现在组织上。党员必须在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同时在组织上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

测量党员党性的四个主要标志

在回答了什么是党性的问题后，任弼时进一步就怎样增强党性进行论述。党性教育和提高党员党性修养要注重具体化和可操作性，这就要求必须明确如何测量党性。任弼时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与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有关，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测量党员党性的四个主要标志。

首先，“要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 and 观点作坚决的斗争。这个斗争是测量党员的党性的主要标志之一”。不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所谓阶级觉悟、阶级意识也能化为乌有。任弼时还强调，要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不要变成公式主义者、教条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要反对机会主义，对妥协、投降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对那污辱和曲解革命理论者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

其次，“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也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党员的利益、党员的愿望，应与党的利益和党的愿望融汇在一起，就是要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要把党的利益

放得高于一切。任弼时批评了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独立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并指出“应当对党内存在的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因为这些倾向是破坏党的组织，破坏党的统一、纪律和团结的。他引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话强调：“党只有当他自己的全体党员都组织成为统一的整个部队——由意志之统一、行动之统一、纪律之统一所团结之部队——时，才能实际领导工人阶级底斗争和指引它走向一个共同目的。”

再次，“遵守纪律，服从组织也是测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党不仅要求每个党员遵守党的铁的纪律，教育党员遵守党的纪律，而且也教育为革命而斗争的阶级遵守一定的纪律。任弼时强调，“党的各个组织，以及每个党员不应该只向群众向别的人要求服从纪律、遵守纪律，而首先自己应该服从纪律、遵守纪律，就是说，首先自己应该克服无组织性与散漫性，克服不遵守纪律、不服从组织等不良倾向”。

最后，“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起来，使得广大群众信赖我们的党，为我党的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争的精神，也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我们党是为无产阶级、为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党。任弼时指出，“我们的党是已经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党，而且仍然为与广大群众取得密切联系而斗争”。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哪个党的组织脱离了群众，失掉了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力量。哪个党员脱离了群众，那他对党便减弱了自己的作用。”

任弼时提出的这四个测量党性的主要标志不仅强调党性的思想性质，提出开展思想斗争来锻炼党性，而且明确从组织纪律和党群关系上来测量党性，可以说是从思想、组织、纪律、作风等各个方面指出了对党员党性修养的具体要求和标准，其理论概括精炼明晰，非常容易理解和操作。

增强党性的关键措施

任弼时指出，在当时，“党的

某些组织中，某些党员身上，尚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和现象”。我们党研究了各方面的具体情形和材料以后，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指出了这些不良倾向和现象，例如在政治上自由行动，独断专行，阳奉阴违；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在思想意识上，一切从个人出发，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等。任弼时强调，这些缺乏党性的倾向和表现，在党内虽然还不是普遍的现象，但在某些个别部分中，确实是严重的，存在着严重的危险。因此，“我党的每个党员都应该深刻地研究和了解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并且应该对照这个决定中所指出的各种不良倾向，虚心、诚恳地、切实地检讨自己的言论行动和思想意识。若果发现自己尚有某样毛病时，便要毫不迟疑地立刻改正它”。

根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任弼时还指出了增强党性的关键措施。例如，要展开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坚决与阳奉阴违的两面性作斗争，并且要彻底肃清这种现象；即时纠正和不纵容错误的发展，若果发现了错误，要正面地、坦白地、诚恳地提出批评；团结互助，爱护干部，帮助他们在政治上进步；为服从纪律和服从组织而斗争；克服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忠实朴素，埋头苦干，实事求是；把理论与实践、工作与研究联系起来，配合起来；每个党员都参加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等。

任弼时提出的这些增强党性的方法在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复杂形势，面对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时代大考，如何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对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提出了新的更高标准和要求。加强党性修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全体党员仍然必须坚持以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加强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严守纪律规矩、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廉洁自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不能积累尽可能丰富的材料，怎么谈得到研究？”

——文艺理论家徐中玉的治学之道

□ 王庆华

徐中玉（1915—2019年），江苏江阴人，文艺理论家，曾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名誉主任、上海市作协主席、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等。著有《古代文艺创作论集》《现代意识与文化传统》《激流中的探索》等，他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迄今发行3000余万册，对一代又一代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发挥了巨大作用。徐中玉作为新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和领路人之一，治学范围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现当代文学与文论等诸多领域，成就卓著，为推进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主张学有所用

在一部自选集中，徐中玉将代序的一篇自传命名为《忧患深深八十年》，以表白自己一直为祖国和人民而深怀强烈忧患意识的赤子之心。他说，“我不想把自己的工作变成只是‘书斋之学’”，“力求研究工作能同现在遭遇的新问题、新情况联系起来，使我的工作不致成为空谈”。徐中玉反复强调文学和文学研究要勇于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强盛的重担，“不能脱离时代，不能不对国家、民族、人民负责”。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艺理论界的学科理论建设开始走向活跃。然而，伴随着理论建设的空前繁荣，在文艺理论界和文学创作实践中也出现

了一些错误论调和不良倾向，并一度流行甚广。徐中玉以其高度的理论敏感性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鲜明地指出了当时文艺理论界的种种偏颇、错误观念和文坛的不良创作倾向，并深入批判了其谬误之处，发表了多篇批判“强调审美性，脱离社会性”“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等观点的文章。他的文艺理论研究也常常围绕着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展开，形成了以问题为中心，批判错误观点与阐发学理、问题分析与规律探讨相结合的研究特色。

在学术著述外，徐中玉以卓越的学术领导力，创建了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和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三个全国性学术团体，创办了《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艺理论研究》等专业刊物。这些学术组织和刊物对新时期文艺理论和古代文论学科的重建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为团结凝聚同行专家、培养青年学者、推动学科发展作出了贡献。他还全力

推动在大学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培养大学生人文素养，为青年人的学习生涯注入了一抹人文亮色。

坚持独立思考

徐中玉坚持独立思考不仅是一种精神品格和价值取向，更是一种学养、功力、眼光。他不但“不唯上，不唯经典著作”，而且绝不趋时阿世、随波逐流，很少受到社会风气和时代思潮的左右。现在看来，他在当时的许多论断都是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作出的独立思考。

世纪之交，文艺理论研究界回顾和反思百年学术历程时发现，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长期处于从国外引进的状态，而相对忽视了本民族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建设，以致在国际文论界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其实，徐中玉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多次指出，文艺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和总目标问题是关系文论发展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引进西

方文论绝不能代替自己的文艺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的民族文艺学建设不可能植根于外国文论之上，“在文艺理论领域里，我们已经基本上脱离了本国文论历史的实际几十年，基本上不是在走自己应走的道路。不是没有一点进步，但整个来说，立足点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先是照搬欧美，然后是照搬苏联，现在又有人照搬外国现代派”。

徐中玉认为，当时我们建构的一些“体系”因其强烈的理论自足性而淡化了与文学创作、批评、鉴赏等文学实践活动的血脉关系，文学理论距离文学实践也越来越远。“我搞文学研究工作，从未想建立什么庞大体系。”徐中玉的文艺理论研究坚持以文学性为本位，对文学的功用，文艺创作、批评、鉴赏中的种种艺术规律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不仅弥补了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格局的不足，而且对推动当代文学创作、批评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徐中玉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常常体现出多元视角下的辩证思维。例如，他反复强调西方文论讲究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辨，中国文论注重整体观照和直观领悟，两者分别代表了中西方不同的思维和表达方式，都是独特民族性的表现。表达真理的方式是多样的，无论是理论思辨还是经验分析，都各有其长。

追求厚积薄发

徐中玉治学非常重视学术积累。他曾反复强调真正的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的材料基础之上：“我是很重视搜集之功，也不辞抄撮之劳的。‘丐妇难为无米之炊’，治古代文论，如不能积累尽可能丰富的材料，怎么谈得到研究？”他在20世纪40年代读研究生时就开始积累文论资料，在被迫搁笔的20年间，依然在“扫地除草之余，新读七百多种书，积下数万张卡片，约计手写远逾一千万字”。正是因为有了

如此丰厚的学术积累，他的文章总是以其材料的丰富翔实而令人叹服不已。

徐中玉治学主张贯通古今中外研究、贯通文论研究与文学作品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发表了一系列对古代文论和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的论文，如《文艺理论研究的方向》《研究文艺理论要把古代的、现代的、外国的三方面沟通起来》等，多次强调文艺理论研究应当贯通古今中外，进行比较，找出各种普遍的规律，而且还应当把文论研究与作品研究联系起来。在具体研究中，他也总是对该主张身体力行，如《古代文论中的“出”“入”说》为了论证文学创作既需要深入生活，又需要跳出生活的圈子进行思考、分析、辨别，他博引了大量的古代文论、现代文论和外国文论的相关资料进行论证。当代文艺理论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是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当代文论分野分明。这种学科内部的分化虽然有利于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但也容易造成研究者学术视野的狭隘，一些跨学科的学术问题更是难以进入研究视域。徐中玉的治学方法，依然成为当今学界正本纠偏具有启示意义。

